

中国史学史

第三册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中国史学史

第三册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北京

中国史学史

第三册

目 录

第十五章 宋代史学的蓬勃发展	553
第一节 概说	553
第二节 宋代国势的风雨飘摇与境内的安定富庶	553
第三节 宋代的文治与文人的天才发挥	555
第四节 宋代史学蓬勃发展的盛况	556
(一) 记注之法完善	556
(二) 史料自由开放、大量印刷与私人修史事业鼎盛	560
1. 《三朝北盟会编》	561
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561
3. 《中兴小纪》	562
4. 《东都事略》	562
(三) 史学批评风气弥漫	563
(四) 历史考据学盛行	571
1. 《新唐书纠谬》	571
2. 《五代史纂误》	573
3. 刊误《汉书》、《后汉书》之作	573
4. 《困学纪闻》	573
(五) 新史学体例出现	574
第十六章 欧阳修揭开宋代史学序幕	580
第一节 极乱局势下的五代史学	580
第二节 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与竖起褒贬史学的	

II 中国史学史

旗帜·····	584
第三节 欧阳修主修《新唐书》·····	591
(一) 关于事增于前 ·····	593
(二) 关于文省于旧 ·····	594
(三) 欧阳修所扮演的角色 ·····	598
第四节 欧阳修与金石学的成立·····	600
第十七章 司马光创写睥睨世界的编年史·····	606
第一节 概论·····	606
第二节 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经过·····	608
第三节 《资治通鉴》的撰写以一人写史兼具集体 写史之长·····	609
第四节 《资治通鉴》为世界最成功的编年史·····	611
第五节 《资治通鉴》取材的广博、考证的精确、 剪裁的细致与文字润饰的理想·····	612
(一) 取材的广博 ·····	612
(二) 考证的精确 ·····	613
(三) 剪裁的细致 ·····	613
(四) 文字润饰的理想 ·····	617
第六节 在《资治通鉴》影响下写成的历史作品·····	619
(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	619
(二) 《资治通鉴纲目》 ·····	620
第七节 《资治通鉴》与宋代正统论之争·····	620
第八节 结语·····	621
第十八章 郑樵的史学·····	625
第一节 郑樵的生平·····	625
第二节 郑樵的会通思想与通史的撰写·····	626

第三节 《通志》二十略在典章制度史上的地位·····	629
第四节 〈通志总序〉中所呈现的史学·····	631
第五节 结语·····	633
第十九章 元代史学·····	637
第一节 蒙古帝国的震撼世界与元朝的建立·····	637
第二节 元修宋、辽、金三史·····	640
(一)《辽史》·····	642
(二)《金史》·····	643
(三)《宋史》·····	644
第三节 元代史学的世界性·····	646
第四节 《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与《元典章》的 纂修·····	650
(一)《蒙古秘史》·····	650
(二)《圣武亲征录》·····	650
(三)《元典章》·····	651
第五节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651
(一)《文献通考》的撰成·····	652
(二)《文献通考》扩大典章制度通史的范围·····	653
(三)《文献通考》中所呈现的史学思想·····	655
1. 会通思想·····	655
2. 历史相因论·····	656
(四)《文献通考》的文献价值·····	657
第六节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658
第二十章 明代政治的严酷与史学发展的受阻·····	664
第一节 明代政治的严酷·····	664
(一)屠杀·····	664

IV 中国史学史

(二) 廷杖	667
(三) 设立东厂、西厂、内厂	667
(四) 设立锦衣卫	668
第二节 史学发展的受阻	669
第三节 宋濂、王祿与丘浚的史学	671
(一) 宋濂	671
(二) 王祿	674
(三) 丘浚	676
第二十一章 明代中叶以后的史学	681
第一节 明代中叶以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681
第二节 私人修史风气之盛与激烈史论的出现	683
第三节 征实史学的建树	686
(一) 王世贞	686
(二) 焦竑	689
(三) 胡应麟	690
第二十二章 清代史学的历史地位	694
第一节 概论	694
第二节 清代历史考据学方法的客观而精密	697
第三节 清代历史考据学产品的丰硕而细致	700
第四节 清代历史考据学使中国史学进入纯学术 研究的阶段	703
第二十三章 清初史学的创新	708
第一节 清初的时势与史学的焕发气象	708
第二节 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崭新治史 方法的出现	709
(一) 普遍归纳证据	712

(二) 反复批评证据	714
(三) 精确提出证据	715
(四) 审慎组合证据	717
(五) 重视直接证据	717
第三节 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的兴起——史学新页的展现	721
(一) 倾力存留明代历史	726
(二) 创写学术思想史	736
第四节 王夫之与中国史学家的历史解释艺术	740
(一) 渊源的追溯	741
(二) 原因的阐释	743
(三) 背景的分析	748
(四) 变迁的缕述	754
(五) 影响的探究	758
第五节 清初史学界的一般情况	765
第二十四章 清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的极盛	788
第一节 清乾嘉时代考据学的极盛与历史考据学派的形成	788
第二节 历史考据学派治史的征实精神	793
第三节 历史考据学派治史的客观方法	795
(一) 归纳方法的充分应用	795
(二) 辅助科学的广泛应用	796
第四节 历史考据学派治史的理论基础	796
第五节 王鸣盛的历史考据学	799
第六节 钱大昕的历史考据学	803
(一) 钱大昕历史考据学的合于近代史学方法	804

VI 中国史学史

1. 杂史的应用	804
2. 善本的应用	806
3. 金石的应用	808
4. 避讳的应用	809
5. 义例的应用	810
(二) 钱大昕历史知识的博雅	811
1. 精于经学	812
2. 精于官制	812
3. 精于地理	813
4. 精于氏族	813
5. 精于金石文字	813
6. 精于音韵	813
7. 精于天算	813
8. 通蒙古文	813
(三) 钱大昕的史学思想	816
(四) 钱大昕论经学与史学的地位	818
(五) 钱大昕肆力治元史	820
第七节 清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的总成绩	823
(一) 注释旧史之作,汗牛充栋	823
(二) 补充旧史之作,蔚为奇观	824
第二十五章 浙东史学的赓续发展——全祖望、邵晋涵与章学诚的史学	829
第一节 概说	829
第二节 全祖望的史学	830
(一) 搜访文献与表章气节——肆力于近代当世之史及文献学术之史	830
(二) 治史的缜密精神与公正态度	838
(三) 由理学而治史学	842

(四) 学问的博雅与身世的悲凉	844
第三节 邵晋涵的史学	845
(一) 浙东史学发展至邵晋涵、章学诚时代所出现 的新猷	845
(二) 邵晋涵与浙东史学	847
(三) 邵晋涵所受当代朴学的冲击	849
(四) 邵晋涵以真挚之情,写一家之史	852
(五) 邵晋涵以敏锐之见,发挥史学思想、史学理论、 史学方法的精蕴	855
(六) 结语	863
第四节 章学诚的史学	864
(一) 概论	864
(二) 生平	865
(三) 提倡六经皆史之说	866
(四) 对史学的新诠释	868
(五) 划分记注与撰述的界线	871
(六) 建立方志学	874
(七) 开辟写史方法论	878
1. 论如何搜集史料	878
2. 论如何采择史料	879
3. 论如何陶铸史料	880
4. 论如何勒成一家之言	883
甲、文体的统一	883
乙、史德的具备	884
丙、别识心裁的立于事文之外	886
(八) 理想中的史学巨著	888
(九) 生前的孤寂与身后声名的远播	895
第二十六章 立于乾嘉学风以外的史学家——崔述与	

Ⅷ 中国史学史

赵翼的史学·····	907
第一节 概述·····	907
第二节 崔述的史学·····	908
(一) 生平·····	908
(二) 《考信录》与史学上的求真·····	910
(三) 崔述的史学渊源及其所受时代的冲激·····	913
第三节 赵翼的史学·····	917
(一) 生平·····	917
(二) 经世的史学思想,超越时代·····	918
(三) 历史解释的艺术,卓然不群·····	920
(四) 眼界开阔,不执成见以论史·····	927
(五) 不确实之病——《廿二史劄记》之误·····	930
1. 未细稽原文而误·····	933
2. 删节原文不慎而误·····	934
3. 照原文钞录不慎而误·····	934
4. 望文生义未尝参稽原文而误·····	935
5. 以部分概括全体而误·····	935
(六) 结语·····	936
第二十七章 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史学的进入黄金时期与 中国史学的由极盛转入衰微·····	944
参考书目·····	953

第十五章 宋代史学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概说

中国自魏晋迄于唐代(二二〇—九〇七年),将近八百年间,一直是史学极盛的时代。朝代变幻,天下丧乱,汹汹之势,不可终日,而史学则绵延发展,无一日中断。到积弱的宋代,史学的发展,更呈蓬勃现象,盛况超越前代。论者或认为宋代是中国史学最盛的时代,如果从史学的某些方面来看,是可以如此下定论的。

史学的发展,靠很多条件。忧患的世纪,往往是史学的黄金时代;而在忧患之中,须有喘息的安定环境;政府开明,崇尚文治,社会富庶,书生奋勉,更是史学蓬勃的要素。稽之宋代,与此数者,无不相合。这是中外历史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谨于下列各节详言之:

第二节 宋代国势的风雨飘摇与境内的安定富庶

宋自太祖代周(九六〇年),定都开封,下传八帝至钦宗,于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钦宗为金人俘虏北去。同年,高宗即位

南京(今河南商丘县),改元建炎。其后又徙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高宗下传九帝至帝昺,于祥兴二年(一二七九年),帝昺蹈海而死,宋亡。后世史学家,将宋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从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年)到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称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从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到帝昺祥兴二年(一二七九年),称南宋,凡一百五十三年,共计三百二十年。

宋代虽然大致统一中国本部,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之局(五代系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历时五十四年,其时又有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北汉等十国,割据称雄),却从来没有强盛过。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外族,始终为宋的大患。宋的国势,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外患相始终。

宋代国势微弱,然宋人智慧洋溢,在强敌环伺之下,利用外交手段,争取到安定和平;“澶渊之盟”,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换取了宋辽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和平相处;宋室南渡,风声鹤唳,亦靠和议,危而复安。大抵宋代三百二十年中,境内安定的时期,在两百五十年以上。以南宋一百五十余年而言,境内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叛乱,小的叛乱,皆人数不多,历时短暂,与汉、唐、明末年所出现的大叛乱,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宋代境内安定如此,其富庶繁荣,遂为史册所艳称。北宋不论,偏安江左的南宋,首都临安,人口已接近百万户,“世界诸城,无能与比”(注一)。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鄂州,人口到达十万户,商舶云集于此。富商巨贾鳞集的成都,往来中国、南海、阿拉伯的中外商船聚集的泉州、广州,人口也都到达十万户。此外数千户到数万户的城市,比比而是(注二)。城市之中,“郭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

虹，节比綦布”(注三)；“歌钟列妓，长街灯火。饮者争席，定场设贾”(注四)。乡村之中，熙熙攘攘，到处有人表演说话、清唱、戏剧、音乐、舞蹈、杂艺，其富庶繁荣，历历如绘。所以以“积弱”著称的宋代，以其安定与富庶繁荣而论，已非积弱二字所能形容了。

宋代国势风雨飘摇，境内安定富庶，忧患重重，而又若值太平盛世，史学家在此环境下，心灵受刺激，又能以从容的岁月，咀文献的英华，史学之盛，遂为必然的发展了。

第三节 宋代的文治与文人的天才发挥

“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践九五之位……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迨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注五)

“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休；朝未尝无小人，而不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注六)

宋代武功不竞，而从宋太祖以后，三百余年中，文治则甚盛。君主的侧隐之心，忠厚之政，一扫五代以来的残酷，而使“天下之

民咸乐其生”(注七)。所以宋代武功虽不能企及于汉唐,而文治则已到达汉唐的水准,甚或已超过了。

宋代的文治,尤其表现在重用文人上面。宋代的国策,是重用文人,宋也是一个不杀士大夫的政权。“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毆刀之辟。”(注八)所以宋代的文人,极为自由,能有充分发挥天才的空间,无拘无束,理学、史学、文学、艺术、科学,于是就蓬勃发展,竞放异彩了。其中史学尤占尽优势。因为史学是自由下的产物,宋代君主仁慈,放任史学家,史学家可以任意写史,无所顾忌,西方开明的十九世纪,不过如此,以致宋代的史学,与西方引以为荣的十九世纪史学,成就若相辉映。中西史学的比较,自此可见其大脉络,大关键。

第四节 宋代史学蓬勃发展的盛况

(一) 记注之法完善

宋代史官记注之法,继唐之后,益趋完善。《宋史·职官志》叙述起居郎及起居舍人的职务云:

“起居郎一人,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事则从,大朝会则与起居舍人对立于殿下螭首之侧。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退,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时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

“起居舍人一人,掌同门下省起居郎。”

宋于门下省设立的起居郎及于中书省设立的起居舍人，都是宋代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所记之事，上自天子言行，下至四方之事，皆书以授著作之官。宋代著作之官，为国史院、实录院中的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他们根据起居郎、起居舍人所记载的极为原始的史料，以及时政记、日历等相关史料，修撰实录及国史；宋自太祖至理宗十四朝，皆修有实录，高宗及孝宗朝的实录，多至五百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所修实录三千三百余卷（惜已亡佚，仅存太祖实录二十卷）；宋代所修国史，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有《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太祖、太宗、真宗称三朝，仁宗、英宗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称四朝），这是北宋各朝的国史，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亦皆修国史。宋人汪藻所谓“古者有国必有史，故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注九），这是论唐以后的修史情况，尤其尽现宋代修史的真相。宋代将史官直接记录的起居注（所谓柱下见闻之实），宰相亲自撰写的时政记（所谓榻前议论之辞），类而次之，修成日历，日历修成后，再由日历修成实录，最后由实录修成国史（注一〇），循序渐进，由疏而密，史学上的记注之法，至是已臻于完善。（宋人所修的日历、实录、国史，自后人视之，皆记注之业。）

唐代修史，未有修日历一项，宋代增加之，最见宋代史学超过唐代史学处。日历之名，始见于唐代，而修日历的制度，未曾建立。至宋代，始设日历所一专门机构，置专官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资料，“会众修撰，为一代之大典”（注一一）。明人徐一夔

曾云：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璩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记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牒，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注一二）

自此可见日历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与起居注、时政记相同。其所根据的资料，极为丰富，除了起居注、时政记以外，似有不少机构的报告资料。宋人黄中曾云：“史院之编修，以日历为根柢，日历之纪次以时政记、起居注与诸司之关报为依据。”（注一三）此与徐夔所云“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相同（关报与关白俱为报告之意）。可知日历是一囊括一代史事的资料长编，在其基础上，会要、实录、国史借以修撰。宋亡以后，元、明、清三代皆未再修日历（注一四）。

宋代所修日历，据《宋史·艺文志》的著录，有《高宗日历》一

千卷、《光宗日历》三百卷、《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又日历一百八十册，可称洋洋大观（注一五）。

宋代于修日历、实录、国史以外，又修会要。会要是档案资料的汇编，属于政书体史书的一种。始修于唐代。唐德宗时苏冕以《唐六典》及《大唐开元礼》为蓝本，编辑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的典章制度沿革，成《唐会要》四十卷。唐宣宗时，又下令续修，成续会要四十卷。北宋初，王溥整理两者，辑成《新编唐会要》（后世简称为《唐会要》）一百卷，分列五百一十四目，缕述唐代各种制度的沿革损益，多为新旧唐书所未载。后来王溥又采五代诸朝典章制度，编成《五代会要》三十卷，分为二百八十目。王溥曾仕于五代，闻见真切，以致五代会要的史料价值甚高，可补《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之缺。

宋朝廷极重视会要的修撰，于秘书省设会要所，专门修撰，所据资料，日历与实录以外，中央六部所属，以及地方诸路监司所有档案，都在网罗之列，因此内容极为丰富、珍贵。其修撰起于宋仁宗天圣八年（一〇三〇年），迄于宁宗时代，凡修十次以上，总计修成二千二百余卷，包括《庆历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元丰增修国朝会要》三百卷、《政和重修国朝会要》一百一十一卷、《乾道续四朝会要》三百卷、《乾道中兴会要》二百卷、《淳熙会要》三百六十八卷、《嘉泰孝宗会要》二百卷、《嘉泰会要》三百二十五卷、《庆元光宗会要》一百卷、《宁宗会要》一百五十卷（注一六）。记注一代之史，使其留传、保存，宋代在这方面的贡献，实居于世界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unique）的地位。